

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

——以天津为例——

张利民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城市文化是随着不同时代城市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变迁而演变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异。本文仅以天津为例，阐述城市的文化积淀，分析沿海等开埠通商城市在外来文化的作用下的重组，以及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特质。

一、依傍河海的商人文化和市俗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与特色是与所处的交通等自然环境有关，不同地区的移民，以及移民的社会职业等与城市文化的形成和特色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沿海和海河是天津早期居民聚集生息的依存条件，也是促使天津城市形成和初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从早期的聚落城邑，到1404年设立卫所前，天津地区人口发展缓慢，仍然没有形成城市的规模。设立卫所到清代中叶开埠通商的四百余年，城市规模扩展不大，而人口增加到近20万，是北方第二大城市。天津城厢居住者的构成，从最初军屯和民屯带来的官兵及家属、流民、渔民、盐工、商人和农民为主，随着运河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增加了水手、码头装卸工，修补船只的船工，船户、商人等。城市的主要功能也开始从军事防御向“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的南北货物转运中心转变，经济功能逐渐成为城市主要功能。

首先，天津的城市文化底蕴是建立在河海氛围之中。居民十分倚重河海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在起居饮食、行为等方面都与河海有关。仅仅从天津居民尊崇神祇的一个方面，既可以体现河海文化底蕴

所固有的兼容性和文化来源的多元性。明代，天津有各种寺庙数十处，神灵不下几十种，清道光年间多达523座。从天后宫的出现和延续也可以了解一斑。天后宫先于天津城出现，到清同治年间有16座；而且每年一度的天后宫庙会成为城厢民众文化娱乐、信息沟通、社交联谊的大型综合性的活动，兼容了乡村、河海运输等多种文化的因素。

其次，商人文化是早期城市文化特色形成的催化剂。“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据1846年前后的《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天津城厢从事商业的竟有17709户之多，占总户数的比重达到54.1%。讲究和气生财和热情好客的商人文化固然得以世代传承；而值得提及的是，以盐商和海船为代表的浮华奢侈之风，对历史并不十分悠久的天津影响不可小视，作为转运中心的经纪人等通过说合带来的赢利，也刺激人们“不种田、不筑厂，赤手空拳即可把钱想”的趋利心理，对天津人口素质以及天津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均有着直接的影响。

其三，代表官府的正统文化根基浅显。一方面是政府的书院、官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盐商为代表巨商对政府和正统文化的主动趋从迎合，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赏识，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在接见盐商，临幸盐商的私人花园。这种正统传统比起杭州、扬州、南京等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显得不够活跃，比起有更为古老的北方燕赵、齐鲁之风也显得缺乏根基，故自正统文化上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质，这一点到了近代表现的尤为突出。

其四，军旅与码头文化揉杂而成的市俗文化。天津最早居民是军队及其家眷、运军和受军事化管

制的水手等，故有“俗尚武健”的社会风习。同时作为河海交汇的商品集散转运地，聚集着众多以此为生的码头装卸工，自然形成了坚韧好斗、“抱团”、讲义气直爽的市风和好管闲事、打抱不平的豪爽气质，在乐于助人上也体现了这样的因素。天津的“混混儿”是天津军旅和码头文化结合的一个畸形产物，他曾以一个特殊群体长期受到指责，但应该看到其生存空间合理性的另一面。当出现深陷混乱的社会波动，人们需要秩序的时候，天津人往往能够看到混混儿的身影，他们混迹于救火会等组织中，成为地方争执和社区问题调节人，说明在天津城市中也混混儿存在的需要和位置。

二、欧风渐进的新气息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后，城市性质开始向近代城市转变，城市规模急速扩大，人口迅猛增加，欧风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的进入，带来冲突和融合，撼动了城市的文化积淀，促使城市文化的来源扩大至全世界。

天津在北方开埠最早，九个国家在这里设立租界，是中国各国租界最多的城市，也是在北方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城市。西方登陆天津后，西方文化以强劲的势头涌入，在思想领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饮食服饰、世俗风尚等方面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如果说在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控制方式、公共理念、价值取向等领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其主要授受对象是官员、知识界和有一定身份的士绅、商人、实业家等；那么，城市景观、宗教活动、衣食住行和娱乐休闲方式等则是普通民众有目共睹的更为直接的感受，另外传媒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从城市景观上，中国城区与租界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租界内立法与司法程序、巡警对公共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水电和供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街道和交通工具的便捷、各国风格的建筑、饮食服装、文化娱乐等方面给人们非常直接的感官认

识，可以十分清楚地分辨出先进与落后，便利与繁琐的差距，显示出对社会全方位的吸引力。

天津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升，也为城市文化演变搭建了平台。近代以后，天津有李鸿章、袁世凯两位重臣长期掌控天津，使其一度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中心和示范，清末的海军和北洋陆军均在这里筹划实施的；并且是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心、北洋军阀的发源地，历任坐镇天津的军政长官都是权势显赫的军阀官僚，有的曾充任总统、总理，培植了一批军阀、官僚和政客，也长期聚集众多的失意下野者。这样的地位，进一步培植和加重了城市文化对政府的依附性和趋从性，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以至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中都有较为突出的痕迹，一些政治运动虽然一度轰轰烈烈，但政府以各种形式稍加干涉，便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明正统文化根基不稳固，一些先进文化也没有广为深厚的影响力。

城市迅速发展，促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混杂。城市迅速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剧增，这些新的移民大多数是周围农村的破产农民、游民等，带来各地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气息。由于城市容纳能力有限，移民社会身份难以转换和上升，就时常在城乡之间流动，使城市文化融入了一些乡村文化的内容，愈是社会的下层，保留的乡村文化和习俗就愈多。

三、城市文化在新起点上的多元化和有限度融合

新旧东西的接触，必然有一个互相排斥、互相容忍到融合的过程。天津自开埠和设立租界之后，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冲撞，也发展到相互并存的过程。原来的城市文化被迫与世界接轨后，在新的层次和起点反映出的多元化突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天津是天主教在华北传教最早的城市，从清朝末年到民国的三十多年间，天主教在天津地区共建立了15座教堂，基督教到

建国前有42座教堂，还有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日本天理会等其他外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在天津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佛、道教继续维持着自己的传播阵地和范围，民间宗教和秘密教门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在理教、弘阳教、天地门教、太上门教、一贯道、九宫道、先天道等。形成本土与西方、公开与秘密的各种宗教共存、互不干涉的兼容性和包容性。

二、风俗习惯的时尚化。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国内有识之士的提倡宣传，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婚姻为例，婚姻的媒介形式出现了社会化和公开化的趋向，自由恋爱取代媒妁之言已成为时髦风尚，择友也突破了封建门当户对的观念；婚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已渐为普遍；另外婚姻不收彩礼、嫁妆愈实用愈好、娶亲不必择日期等等新风气日渐形成。另外，社交礼节也在演变。

三、生活观念的开放化。天津作为北方首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地，在经济与社会发生许多变革的同时，社会风尚和观念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如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对电车从抵制到普遍利用、外来饮食和娱乐在不同层次也有不同程度的吸纳。

必须看到，在社会阶层流动还是相当有限的前提下，天津的外国人和各层次的群体，各有其社区和社交范围，各自代表的精英文化、商人文化、市俗文化和租界文化等彼此难以沟通，不应该夸大其影响力。对于多向来源的文化，也并非全盘接收和融合，一些方面从抵制到融合，一些方面始终难以承受，而在一些方面各有其传播和展示的范围，互不干涉，相安无事。

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等，是天津民众对外来文化本能性的抵制和反抗，这里既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也有中西文化趋向、风俗习惯的隔阂等原因。租界与中国城区在居住环境、交往、饮食等方面共存共生，各有发展，有些趋向一致，也有些长期同步发展却并不融合。在这里，城市与乡村文化、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以及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体现，既相互揉杂，又不能全面的吸纳和融合，反映了天津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等的兼容性强于融合，旁观和抵触强于主动接受的特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近代中国北方城市的文化特色。